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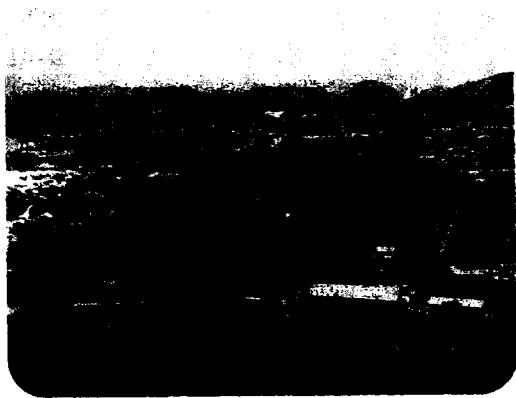
##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周口店是盛产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很久以前附近的居民就知道，所以将这些大量出化石的山起名叫“龙骨山”。由于周口店特殊的地理环境，那一带的山洞特别多，这种冬暖夏凉，既可以避风挡雨，又能够防止野兽袭击的洞穴，实在是尚处在“穴居野处”时代先民的理想住所。

上个世纪 20 年代周口店就已经引起了中外科学家们的注意，正式的发掘可以追溯到 1927 年。这一年在洛克费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式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取得了巨大成果，发现各种脊椎动物化石多达 500 箱，令人惊叹不已！可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最重要的发现却是在 1929 年以后。

1929 年 12 月 2 日是周口店发掘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农历“立冬”以后，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这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尤其是在周口店，那些低矮的山峦根本阻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冷空气。虽然还没有到滴水成冰的程度，但是寒气逼人，朔风似刀。参加周口店发掘的民工都已经穿上臃肿的青布棉袄和棉裤。作为发掘主持人的裴文中，那年还是个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即使再冷，他也得穿上棉布大袍坚守在发



周口店“龙骨山”远景

掘现场。

这天出土的化石特别多，本应当在下午4点收工，但是大家很兴奋，自愿加班加点，不肯撤离工地。太阳下山以后，在距离地表40米以下接近洞穴的底部，发掘的空间仅容得下三四个人，而且光线很暗，几乎看不清1米之外的东西。发掘人员只好手持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挥铲操作。考古工作者们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越发不能有半点松懈，因为许多重要的发现，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从人们不注意的眼神下“溜掉”。于是，大家屏住呼吸，期待奇迹的出现。突然，有人用手铲触到一个坚硬而平滑的东西，裴文中大声叫：“停！”他仔细观察之后，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周围的人说：“是人头骨！”在场的人群情激奋，忘却了寒冷和饥饿，小心翼翼地将这块贵重的化石取了出来。1957年笔者到周口店参观的时候，见到了当时参加发掘的民工刘先生（那时他已经60多岁），他说：“最初我还以为是人的膝盖呐，经裴先生一讲，我才知道是一个罕见的完整人类头盖骨。”这一人类祖先化石在地下“长眠”四十多万年，终于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真容。

“北京人”遗址发掘现场



的完整人类头盖骨。”这一人类祖先化石在地下“长眠”四十多万年，终于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真容。

参加发掘人们的兴奋自不待言，经过连夜的简单包装，第二天一大早，由裴文中护送到北京。

12月28日下午，中国地质学会由翁文灏主持举行了特别会议，会上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与会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闻之无不喜形于色。周口店的重大发现不久就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一时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



“北京人”遗址发掘现场



“北京人”头盖骨发现现场

经过有关专家，特别是加拿大籍的人类学家步达生

(D.Black 1884~1934 ) 鉴定，他提议命名为

“中国猿人北京种”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后来改称为“北京直立人” (Homo erectus pekingensis)，或者简称“北京人”，这也就是我们过去习惯上叫的“中国猿人”。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在人类学

发展历史的研究上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之前，

虽然 1856 年在德国发现过尼安德特人，1901 年在印尼发现过爪哇人，1907 年在德国发现过海德堡人，但是当时由于受保守思想的束缚，这些发现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北京人”打制的石器和用火的痕迹，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谓的“直立人”（即过去所说的“猿人”）的存在得到了肯定。这一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重要环节为“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截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共发现了 5 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另外有下颌骨化石 14 块，牙齿 150 多个以及少量的躯干骨，这些化石代表了 40 个左右人的个体。

极为遗憾的是这些足以改写历史的早期人类化石，却在战火中不幸遗失。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为了不使“北京人”的化石受到损害，委托美国籍医生弗利将化石带到国外保存。弗利离开北京时恰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途中不幸被日军俘虏。从此以后“北京人”化石标本全部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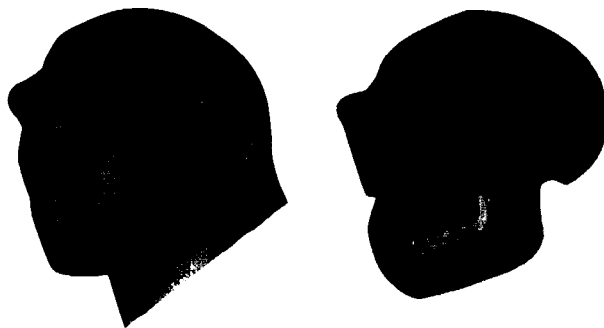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36 年发现)

“北京人”的脑容量平均为 1043 立方厘米，介于现代人和猿类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厚了大约一倍，眉嵴粗壮而突出，左右眉嵴互相联结，形成屋檐状，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即在头顶上有一条前后纵贯的突起），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的面部相对较短，吻部向前伸，没有现代人那样的下颏，鼻骨低而扁，颧骨明显，牙齿粗壮。复原后的形象带有猿类的某些特征。“北京人”的下肢骨和现代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说明他们可以直立行走。人类学家根据“北京人”大腿骨长度推算，男子的身高为 157 厘米左右，女子为 150 厘米上下，比现代华北人身材低 10 余厘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一些人的头盖骨和其他骨骼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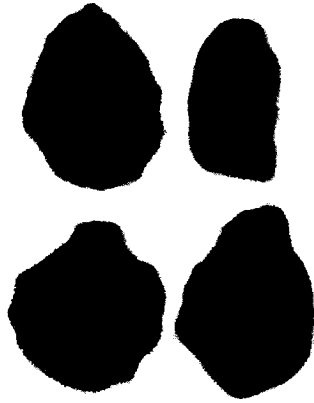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29 年发现）

和“北京人”同时存在的动物有：肿骨鹿、葛氏斑鹿、李氏野猪、梅氏犀牛、三门马、鬣狗、羚羊、剑齿象以及各种啮齿动物。这些动物全都是地质学上所谓的第四纪更



“北京人”复原图

新世中期的产物，距现在的年代大约在 30~50 万年之间。这样，由于和“北京人”共生动物的年代的确定，“北京人”生存时代也就大体上定了下来。



“北京人”使用的打制石器

1931 年裴文中等人在周口店遗址确认了和“北京人”有密切关系的大量石器（连同制作石器时敲击下来的碎块在内，总数不下 10 万件，但是真正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器仅占 1%）。这些用石英岩和燧石制作的工具有尖状器、刮削器、砍斫器、手斧、石砧……就是当时人主

要的生产工具。这一年还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灰烬、炭化的朴树籽、烧裂的石块等并不连成片，说明这些痕迹不是野火造成的，而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火所留下来的。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用火可以驱赶野兽、照明、取暖和熟食，这是人类的重大发明，这一发明最后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蔡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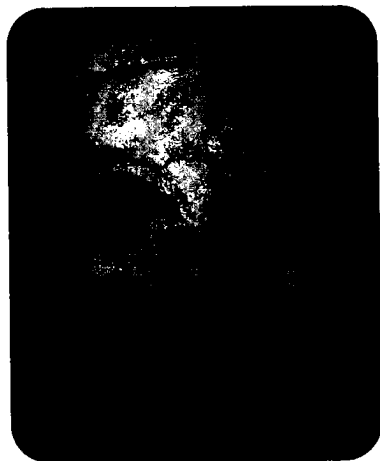
## 红山文化“女神像”

上个世纪 30 年代由日本人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当时为热河省赤峰县）红山后遗址调查发掘，红山文化由此被发现。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我们对这一文化了解不是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单位多次组织调查或试掘，确认这一距今 5000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地区，在吉林省西北部也有少量发现。

红山文化发现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其文化性质、年代界限和该文化与中原地区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边陲地区的文化竟然蕴含着无穷的宝藏，而这些宝藏的重见天日，改变了人们对文明史的看法。

1981 年，在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庙”惊动了国内外的历史、考古、文化和艺术各个方面的人士。

牛河梁是位于辽宁省凌源和建平两县的交界处的山梁。在此遗址发现之前，考古学家们往往以平原、靠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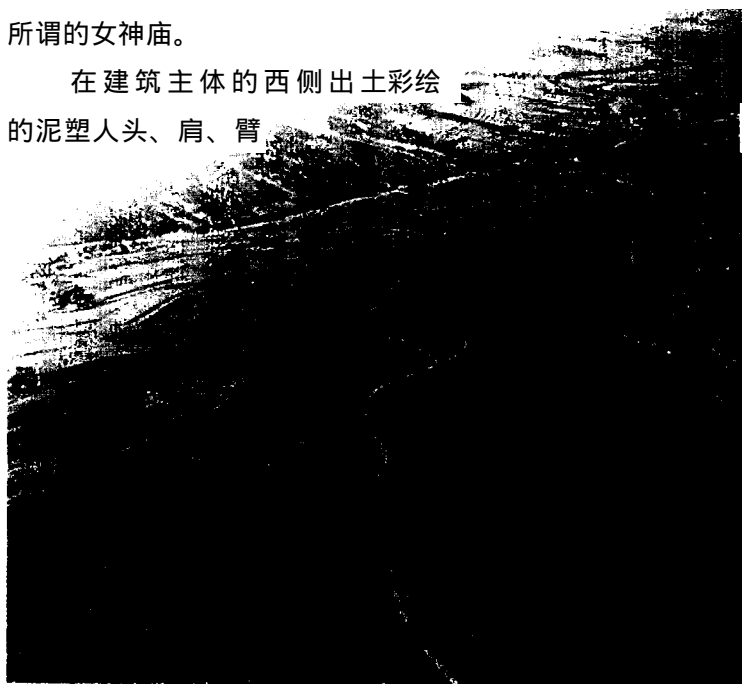


女神头像

源或者是平缓向阳的山坡为考察对象，但就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山顶上，“女神”们却安然地沉睡了五千多年。“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醒来的女神抖去尘土，将一连串难解之谜赐予她的子孙。

在牛河梁主梁的北山丘顶有一个“平台”，那儿地势较高，俯视四周，所有景色一览无余。“平台”的面积范围是南北 175 米，东西 159 米。在这一范围内到处散布着红陶片和烧土块，红陶片可能是古代人举行祭祀仪式时祭器破碎后遗留下来的，烧土块是当时的建筑物倒塌后的遗存，在“平台”的边缘还有断断续续的石墙。在“平台”南侧下面平缓坡地上，发现了一处总长度为 18 米的建筑遗迹。该建筑遗迹分为南北两部分，即北面的多室建筑群和南面的单室建筑。北面的多室建筑是建筑的主体，南面的单室是附属建筑，二者间隔 2.05 米。这就是考古学家们所谓的女神庙。

在建筑主体的西侧出土彩绘的泥塑人头、肩、臂



牛河梁遗址远景



女神像出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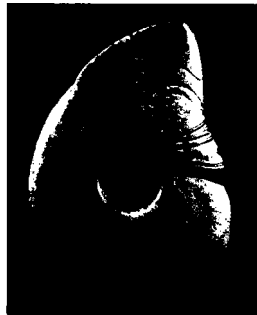
手、乳房残件以及动物像残块，如“猪龙”的头、蹄等，还有彩绘的壁面残块。室底和墙壁皆经过焙烧，室底平整而光滑。

在出土的泥塑像残块中以人物像为主，其次是动物像。

和真人大小相仿的人头是这群泥塑中最为精美的。虽然鼻子部分有些缺失，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牛河梁先民的艺术创作水平。这个人头的额顶发迹平直起棱，鬓角整齐，耳朵长圆，眉间处圆而凸出，鼻梁比较低。眼窝浅，眼内嵌闪闪发光的圆形玉片，表示眼球，所以显得炯炯有神。眼梢上挑，颧骨高耸。嘴部阔大而向外咧。下巴略尖。出土的时候色彩鲜艳。女神塑像的面部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特征，说明塑造这些女神像的工匠们是以本民族女性为模特儿的。

发现的泥塑人体肩部残块，上至颈根，下到胸部。泥胎细腻，曲线圆润，造型写实，具有女性肩部的特征。

出土的乳房残块大小和形态不一。其中的一块保存比较完整，系右侧乳房，基本上和真人的一样大小，当系



青少年女性个体的。

出土的人手泥塑有一件比普通人的手略微大一些，手指细长，五指伸张，有动感。

在动物泥塑中有猪龙和禽类。猪龙的大部分已经残缺，仅有头、耳、吻部及前身、下肢。猪龙呈扁圆形，形体和该遗址的墓葬出土的玉龙比较接近。但是玉龙已经图案化，泥塑的玉龙有下肢和蹄爪。禽类只有爪部，弯曲并拢奋力抓攫状。

除了动物泥塑之外，还有各种陶制的祭祀用具。

以上的各种人和动物塑像以及陶器都和对神的祭祀有密切关系。可以想象，当年这个神庙供奉着和人体一样大小，甚至于比真人还高大的女神，在神像的四周有各种神格化的动物维护，人们向这些神灵乞求农作物丰收、人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泥塑人体残块



丁兴旺，氏族平安。至于那时举行怎样的仪式和使用什么供品，现在就难以考证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们只能根据现代的民族学资料作推测。

在早期的氏族社会里，女性受到人们的尊敬。原因是女性在家务劳动中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女人可以维持家庭的稳定、生儿育女。所以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起在欧洲许多遗址中经常发现石雕、泥塑或者是用动物骨骼刻的女性形象。不过那些妇女雕像形体比较小，不是供奉在庙堂里的神像，而可能是放在房屋的壁龛里或者做为“护身符”佩带在身上。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类的小雕像，在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过人体造型的陶器和小型的人头，和红山文化的女神像不能比拟。

在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些孕妇的泥塑像，可以证明这些泥塑的孕妇在当时也被人视为神灵。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发现不仅使我们看到先民的艺术创作，而且为研究我国的宗教历史以及种族体质提供了实物资料。

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一次学术讲演中

指出，牛河梁的发现，说明在西辽河流域，早在五千年前就有“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

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引起了研究古国史的热潮，同时也引发了“重新建立中国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的讨论。过去史学界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现在看来，以黄河流域的文明为中心，这个摇篮区可以扩大到辽西地区。

（蔡凤书）

## 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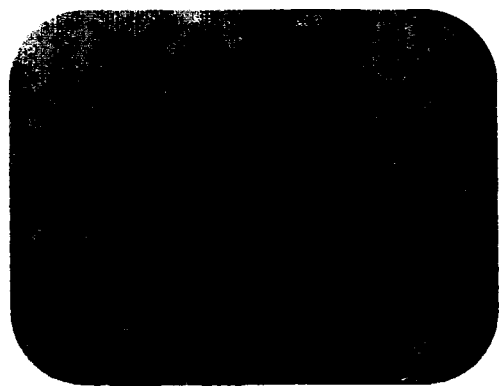
龙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动物。根据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中国人想象中的龙和近代古生物学上那种身长数米甚至于十数米、全身被甲的所谓的恐龙并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这并非说我们是龙的后代，而是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由来已久。

中国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崇拜龙？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内蒙古自治区牛翁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细长而作曲折状的玉龙，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到用玉石雕刻成的猪形龙和泥塑的猪形龙，在南方的

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龙的形象，它们的年代大约为距今5000年；时代稍微晚一些，在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遗址出土过绘有盘龙的红陶盘，

陶寺遗址是龙山文化晚期遗迹，时代为距今4500年，据学者们的研究证实，那个时代相当于历史文献上的陶唐时代，对龙的崇拜已经稳定，龙的形象也模式化。那么中国人



龙虎蚌塑

对龙的崇拜在时代上是否还可以向追溯呢？

1981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龙和虎的蚌塑，龙的形象和文献中或者是绘画上表现的很一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时代最早的龙的造型，从而把我们祖先崇拜龙的历史上溯到 5500 年前。

西水坡遗址第 45 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东西长 3.1 米，南北宽 4.1 米，和该遗址的其他墓葬相比，显然大得多。这些墓的墓底平整，墓的四周经过刻意加工修整。经人类学家鉴定，该墓的主人是一壮年男子，身高达 1.84 米，比仰韶文化时期的男性平均身高高出 15 厘米之多。该墓的主人仰身直肢，面部向上，头南足北，埋葬于墓室的正中。在这座墓中还有三个人分别埋葬在东、西、北三面的小龕里，他们可能是墓主人的随葬者。东部的随葬者骨架保存不好，性别和年龄难以鉴定；西部的随葬者身长仅 1.15 米，是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幼童，性别难辨；南部随葬者身长 1.65 米，是个 15 或 16 岁上下的少年男子。这三个随葬者都是非正常死亡，很可能是在墓主人下葬前杀死后埋葬的。

墓室正中的死者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在东侧，虎在西侧。这个摆放的位置并不是随意的，我们在汉代以后青铜制作的神兽镜上可以看到“左龙右虎辟不祥”的铭文，由此可见，龙和虎作为神物可以辟邪的观念由来已久。

西水坡 45 号墓的蚌塑龙头朝北，背朝西，身长几乎与人相等（1.78 米），高 0.67 米，龙首高昂，弓身曲颈，长尾飘逸，似欲腾飞之状。这种龙的形象和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如北京故宫或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大成殿的盘龙十分相似。蚌塑虎的形象是根据当时人们现实生活中所见的动

物为模特儿，非常写实。虎的图案在人骨架的西侧，头北背东，和龙的图案相背，身長 1.39 米，高 0.63 米，这也和现实生活的华南虎差不多。虎头虽然微低，但是虎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似在行走；虎视眈眈地守护着墓主人。



墓主人死后在其两侧摆塑龙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辟不祥”。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这个墓的主人

生前的社会地位煊赫，握有一定大权，不同于一般的民众。他死了，氏族的成员一方面要用蚌壳堆塑龙虎为他“保驾”，另一方面还要杀死一些少年男女为他陪葬。

1981 年西水坡遗址龙虎蚌塑遗迹发现后，事隔 7 年，在同一遗址的发掘中又再次发现了两组蚌塑。其中的一组在前面所提到的 45 号墓南面，与 45 号墓相距 20 米，其图案有龙、鹿和蜘蛛，龙头朝南，背朝北，虎头朝北，面向西，鹿卧于虎的背上，蜘蛛摆在龙头的东面。另外一组蚌塑在上述一组的南面。图案是人骑龙虎。

上述各种图案虽然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龙是主要的。当时的人崇拜龙，而且希望借助于龙能够升天。

西水坡遗址的发现不仅把中华民族崇拜龙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 3500 年，而且通过这些发现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

过去学术界通常认为仰韶文化是处在原始社会的发达阶段，氏族成员一律平等，没有阶级的划分，也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但是西水坡的发现证明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蚌塑墓的发现说明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阶层，他们生前可能是氏族的酋长或者是其他权贵人物，氏族成员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当然我们还不能够断定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产生了国家。按照列宁的说法，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全世界的学者都承认国家是文明社会成熟的标志。现在的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作为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城市、金属工具的制作以及使用成套的礼仪（包括宗庙建筑）。这几乎已经达成共识。从考古学的研究来看，这些因素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大体上具备。在郑州西山仰韶文化

遗址中发现了夯土版筑的城址，在陕西省临潼市姜寨仰韶文化的遗迹中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铜片。现在，在西水坡遗址又发现了反映当时人宗教信仰和阶级分化的迹象。这样，对于过去传统的看法必须重新审视，关于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也因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蔡凤书）

西水坡蚌塑墓平面图

